

中国民间故事

类型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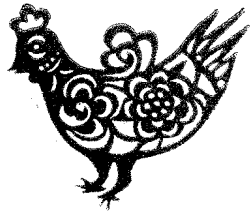
丁乃通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Y 714/11

~~DE14/36~~



丁乃通 编著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郑建成 李 惊 译
商孟可 白 丁
李广成 校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本书译自芬兰科学院1978年赫尔辛基版)

责任编辑：白丁 刘蕴杰

封面题字：马 振

装帧设计：白作城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28 印张：20½ 插页：2 字数：37万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229·0205

定价：3.70元

序

钟 敬 文

最近，我重读了丁乃通教授这部关于我国民间故事类型及索引的著作，使我联想到世界和中国的民间故事学，广泛一点说，民间文艺学，它的兴起及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现在的种种成就，因而使我对这本书更感到兴趣，也更加思索着这类著作的学术意义。

丁乃通教授原是一位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十多年来，他又成为孜孜不倦地钻研我国民间故事的学者。他特别重视我国民间故事的类型整理工作。他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译本的原著，就是一九七八年，在芬兰首都刊行的。

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整理工作，在前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有一位当时住在香港的英文杂志经营者和编辑者戴尼斯(N. B. Dennys)初步尝试过。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我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象有些同志所知道，我整理的故事类型，先后曾在《民俗学专号》〔《开展月刊》〕及日本《民俗学》月刊等上面发表过)。但是我刚走了几步，就停脚了。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德国学者W. 爱伯哈德博士曾经刊行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丁教授这部《索引》是这方面的最新著作。它距离我和爱伯哈德博士的旧著的出世时期已经四、五十年了。

丁教授这部新著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之点。首先，当然要数它所运用的资料的丰富。象著者所自述，他为

了找寻这部故事类型的资料，曾经跑遍美国和欧洲的图书馆。他所使用的材料，不仅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收集、出版的，并且也有采取自我国古代文献的。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大量地利用了全国解放后所收集、记录的，而当时国外有些学者正企图全盘否定这种记录的科学价值。本书后面附录了一个数量达六百余种《参考书目》。就是比较熟悉这方面情况的我，看了这个书目，也觉得其中有些是自己从来不知道的。而远居太平洋彼岸的著者，却能找到并使用了它。这怎能不使人感佩呢？

其次，是编著者在整个工作上的认真。他化了近十年的岁月，从事这项工作。不仅象上节提到的在资料搜集上费尽工力，他的全部作业都是那样认真、严谨的。他以运用阿尔尼和汤普森的国际故事分类为主，排除各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苦心地整理出几百个类型（国际共通的和中国特有的），并各记上有关的文献。在全书的前面，冠以长篇《导言》，书末除《参考书目》外，还附有《中日故事类型对照表》、《专题索引》等。这是一件绞尽心血的科学工作。索引一类的著述，在学术上是很需要的，但编纂起来却是相当烦琐的。有些眼睛向上的学者根本瞧不起这种工作。过去我曾经暗暗赞叹陈垣先生编纂《中西回史日历》和叶绍钧（圣陶）先生编纂《十三经索引》的业绩。以他们的学术成就（陈）和创作才能（叶），却甘愿来过这种不显眼的“冷淡生活”。如果不是胸襟宽广和具有为广大学界服务的决心，是办不到的。这也正是我们要向这部索引的著者表示敬意的地方。

再次，是著者对中国的和国际的民间故事类型异同

问题的意见。丁教授在他那篇精心撰著的《导言》里表述了一些优异的见解。这里我只指出他关于中外故事类型异同的结论。有些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民间故事是自成系统的东西，它跟国际的民间故事类型很少相同。这种论调，在没有得到有力的事实反驳之前，是颇容易被人相信的。对此，丁教授的实际作业给予了正确的回答。他用确凿的统计数字说话：

百分之几的中国故事类型可以认为是国际的故事呢？本书列入了八四三个类型和次类型，仅有二六三个是中国特有的。就连这些也有少数和西方同类的故事差距并不大，也有的类型在中国邻近地方，例如越南曾经发现过的。

即使我们对他所说的数字打了些折扣，这个结论，仍然是使人惊异的。三年前，关敬吾博士在为自己所编录的日本民间故事集中译本作的序言上说，他重读了我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认为中国的民间故事有一半以上与日本的民间故事相同或者类似。我看了颇为惊讶。尽管我当年所编成的故事类型很少，而我也知道日本故事跟中国相同或类似的相当多，但他这个估计（自然是约略的）却仍然出乎我的意想之外。丁教授上述的结论正使我产生同样的反应，并且还感到在这种学艺上国际亲缘关系的喜悦。

总之，丁教授这部花费了许多年月编著成的中国故事类型索引，是对于我国民间文艺学建设上一件极有益的作业。尽管由于他久居海外及我们对本国民间文艺学史料没有科学的清理，使他在《导言》的论述上不免有个别值得斟酌之处（如关于“童话”一词的来源及对冯飞、林兰业绩的评价等）。又象他自己所预料的，由于几年来国内收集工作的发展等原因，故事的类型和索

引，将有某些“增订的必要”。但是，象许多优秀的著作大都会带点不足之处一样，这种“微瑕”是决无伤于它的整个成就的。

趁此机会，我想略谈自己对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编著条件、作用及它在我们民间故事学上的位置等问题的一点看法。

民间故事的研究有各种观点和方法。象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人类学派的故事学（哈特兰德等），就是一种。又如苏联学者普罗普教授的形态学的研究（它被推为法国结构主义这方面理论的始祖），也是一种。又如近来日本河合隼雄教授的深层心理学的研究，当然又是一种。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编著，以AT分类法为最著名。它由芬兰学者阿尔尼发表于本世纪十年，（此后，他还发表过关于芬兰民间故事及传说的索引），后来美国学者汤普森加以译述和补充。近年来日本学界对它颇为看重，著名学者柳田国男、关敬吾等都有类似的著作（《日本民间故事名汇》、《民间故事的类型》等）。记得几年前，日本民间文学学者以臼田甚五郎为首的访华团诸先生，也曾经向我们提议合作编著这种类型索引。可见他们对此道态度的一班了。

这类故事类型索引的编著，不管所处理的对象是一国的，或是全世界的，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它所涉及的范围内，流传故事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文字记录，而且其中有不少篇章的情节是大同小异的（可能少数是小同大异的）。而这种情形，在各国民间故事方面是比较显著的。这就使这类著作的编纂成为可能，乃至必要。

这种故事类型索引，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想，如

果你是一个普通学人，它可以引导你去了解一个国家或者全世界的民间故事的类似情形，乃至由此窥见它（民间故事）的大略状貌。如果你是一位民间文艺研究者，你将在上述的作用之外，引起对某些类型故事进行探索或进一步搜集它的兴趣，或者你将被引起对于民间故事的某些宏观概念，并从这里进一步去给以钻研、阐发。自然，它最普通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工具书去供检查。因为有上述这些用处，它的产生和存在是自然的。也因此，那些辛劳地从事了这种工作的学者是值得敬重的。

如上所说，从整个民间故事学的观点看，这种工作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只是整体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环节。我们所理解和要求的故事学，主要是对故事这类特殊意识形态的一种研究。它首先把故事作为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们的精神产物看待。研究者联系着它产生和流传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对它的内容、表现技术以及演唱的人和情景等进行分析、论证，以达到阐明这种民众文艺的性质、特点、形态变化及社会功用等的目的。类型索引的编著乃至根据这种观点、方法的探索，一般比较不重视故事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的分析和阐明。它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故事梗概的共同点及相异点，比较重视探究故事的流变过程和原始形态。没有疑问，应该说这种探索成果，对整个故事学的建立是有益的，对我们的研究来说，也是有用的。对于某些作品，或这种口头文学体裁的某些侧面，这种作法，不仅是有用的，甚至于是必要的（当然，主要是在我们的指导思想统率下）。但是，作为一种故事的整理、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它跟我们所奉行的，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如此，我们今后还要用一定的人力去编纂《中

国故事类型索引》乃至编纂《中国传说类型索引》(这是前几年丁教授回国讲学时,亲口向我提议的)。它是我们这门科学(故事学)发展的需要,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需要。

丁乃通教授,现在是美籍的学者。但他不忘出生和受过教育的祖国。他热烈地爱她。他不仅化费巨大的精力,编著这部祖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索引(还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象《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等)。近年他又一再回来看望大陆的山河和同胞,殷殷关心祖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对于后者,他还充当了护法金刚。当海外有某些学者对我国民间文艺方面的活动或人物,有误解甚至于诬蔑的时候,他是那样“义形于色”地站出来为她辩护。他真不愧为有出息的炎黄子孙的后裔!

几年前,丁教授应招回国讲学时,我有幸一再和他握手倾谈。他的原籍是杭州。他用亲切的语言,谈起他在家乡中学读书时所知道的我在当地的学术活动。那时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出于对祖国民间文化的眷爱,不顾一切地在搞民间文艺和民俗的搜集、出版和探索工作。教授的谈话,引起了我对半个世纪前,在西子湖边那段生活的回忆。它象梦境一样,反映在我的脑屏上。它给了我欣悦,也使我感到惭愧——当时我在任何方面都是那么幼稚!

这个译本的原著(英文),作者曾经寄赠过我。现在它由北京大学的老师们比较完整地给译成中文出版。这不但会使“身在海外,心在祖国”的丁教授感到高兴,作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致力者和著者朋友的我,同样是满心欢喜。我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现,能给我们这方面,

中、青年学者一定的知识和启发。它将成为一颗落在肥沃土地上的种子。它一定会开花结果。我想，这也正是作者希望在祖国出版界首先看到这个译本出现的本意吧。

承丁教授一再表示要我为他的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作序。这个任务，使我感到光荣，也感到惶恐。我生怕犯那“佛头点粪”的讥笑。但是，他的好意（还有其他朋友的劝勉），终使我勇敢地提起笔来。只要我的话不致贻误读者，我就将稍稍感到自慰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廿六日，作于北京国谊宾馆。

序

贾 芝

中国是一个民间故事宝库，然而比起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来，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因而长久不为世人所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民间故事集，给人留下了一些点滴然而却是深刻的印象，比如孟姜女的故事、徐文长的故事，傻女婿笑话等等。那时，少数热心提倡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人，也并无中国民间故事多到可说是一个宝库的概念。了解和认识到中国是世界民间故事的一个宝库，这是今天的事，是在解放后广泛搜集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故事过程中的新发现。对于这样一个收藏着人民的闪光的智慧和艺术结晶的巨大故事宝库进行有计划地发掘和采录工作，也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起步的。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的十七年中，我们已经搜集、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其中少数民族的作品占了很突出的地位，那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就是汉族的故事、传说的搜集发表，也使人们耳目一新。为什么竟能做出前人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找到和开发了民间故事的大宝库？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好的条件深入群众进行搜集工作。新文艺工作者继承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首先深入农村搜集民间故事，如董均伦、孙剑冰、肖崇素等同志参加搜集工作都属于这种情况。还有

随军到边疆地区的同志，他们有机会搜集了少数民族的民歌、民间故事。再就是从事民族语言调查、民族调查的学者，他们都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角度忠实地采录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口传作品。解放不久，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为中心，提倡和发动全国各地搜集民间故事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截止到1962年，我与孙剑冰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一、二集，就已经收入了43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近几年来民间文学的广泛搜集和研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潮，我把它称为第二个“黄金时代^①。”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和出版几乎成为这一阶段工作的引人注目的中心，也是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之一。在“抢救”的口号下，各地区、各民族都在搜集和出版当地的民间故事、传说，培训民间文学骨干的工作也多采用现场学习记录民间故事的方式，参加这一工作的主要是广大基层文化工作者。普查正在逐步展开。今天，人们才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个民间故事的宝库。简直可以说，无处不有故事和传说。淳朴、善良、勤动、勇敢的美德孕育了故事。山水树木，花鸟虫鱼，都附会着美丽的传说。现在我们所搜集到的也还仅仅是一部分。

把建国以来搜集出版的民间故事与解放前出版的民间故事作个比较，就会看到我们对人民的这一文化宝库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结，我们还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我们正在逐步认识自己。

① 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亲自倡导全国采风运动的时期。那个时期的特点是搜集民歌，从采风发展为民间文学的全面调查和研究，为中国民间文学工作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国外学者对中国民间故事宝藏之丰富了解甚少，甚至还存在着与实际相差极远的错误观念，比如有人说中国没有动物故事。事实上，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许多妙趣横生的动物故事，就是在汉族中也有很生动的动物故事流传。这些故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人以启迪。对于这一点，过去不仅国外学者几乎一无所知，就是我国学者也是知之甚少的。

今天，当我们在进行民间故事普查并逐步建立科学研究的时候，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对我们的搜集家和研究家应该说是一件珍贵的礼物。它的中译本的出版是很合时宜的。

丁乃通先生是世界民间故事研究家，他酷爱祖国。他将中国的民间故事与同中国相邻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民间故事就其分布、流传与内容的变异作了一次有益的鸟瞰。他根据阿尔尼和汤普森分类制（简称AT分类法）编纂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丁先生在他的书中，以统计数字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国际性做出了有力的说明。书中共列入843个类型和次类型，仅有268个是中国特有的，其他575个均为国际性的故事，就连中国特有的这一部分中也有少数同西方同类故事差距不大或在邻国有流传的。丁先生的这部书对于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都是一大贡献。它为人们打开了眼界，便于将中国民间故事与世界各国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认识中国民间故事的产生流传及其在口头文学上的独特造诣，认识和探索民间创作的共同规律。同时，这本书也可以使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民间故事宝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艺术创作才能，展示出中华民族的文明，让世人灵犀相通。

三年前，我到日本访问，日本学者建议我们编一本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说他们研究中国的民间故事至今仍以1937年艾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为依据。这话不免使我感到有些吃惊。而这时，丁乃通先生新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已在芬兰赫尔辛基出版了。

我们不会忘记在建立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上任何一位学者所付出的辛劳。艾伯哈德先生对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作了可贵的第一次尝演。遗憾的是，在旧中国那个时代，他所能看到的中国民间故事资料使他受到了限制。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民间故事书刊和一部分中国古籍文献，何况又是依靠一位叫曹松叶的中国助手为他搜集的。那时候，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可说是刚刚开始，艾伯哈德先生则是站在中国民间故事宝库的门外来编纂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他仅依靠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搜求已有的出版物，钩沉古籍，很难对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做出系统的研究、分类以至正确的判断。他的叙述和论断，往往使我们隔靴搔痒之感。艾伯哈德先生在他的书中说：他的书首先为我们的研究家“提供比较全面的、经过整理的中国民间故事”，这不过是一个根本达不到的，被夸大了的良好愿望而已。

艾伯哈德先生搜罗古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未加区分地收入书中，他却忽视了中国除汉族以外还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大量民间故事尚未搜集。其《类型》一书中对民间流传的民间故事与古代文献中的简略记载也未能区别开来。艾伯哈德先生的《类型》一书是以德文出版的，它可以使外国学者寻到一些中国民间文学的闪光

的珠贝，也可以使研究者从他集中的若干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看到通往中国民间故事宝库的荒径小道，这对后来研究者的探索是有益的。然而，尽管如此，它也只能说是一个残缺不全、瑕瑜斑驳的混杂体。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过时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解放以后，艾伯哈德先生没有纠正他书中的谬误，也没有根据新材料把它修改、补充成一部完善的书，反而对中国民间文学工作采取了否定和不友好的态度。他竟然说：“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人从远古以来便没有关系，中国学者不应该研究少数民族的故事。”^①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无稽之谈！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所共同创造的。解放后，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史诗、长篇叙事诗以及谚语、谜语等等的不断地被发掘出版，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宝藏中最引人注目的绚丽多彩的部分，这是当代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显著成就和特点之一。艾伯哈德先生的这种言论如果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也只能说明他的无知和偏见。

丁乃通先生对自五十年代起就被那些敌视新中国分子操纵的美国汉学界和深受其影响的民俗学界，有时曾感到绝望，但他相信真理会获得胜利。一九六〇年前后，他写文章批驳了个别民俗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诋毁和蓄意攻击，然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艾伯哈德先生和年轻的华裔学者晏先生为了适应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在一位美国民俗学权威的参与下，宣扬说：“中国在解放前搜集的民间故事是可靠的，解放后搜集的民间故事是不可靠的。”并说我们造假的目的就是为

^① 见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译本序言。

了进行政治宣传，晏某甚至把我们重视搜集和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也说成是什么“为了侵略别的国家，是拿民间文学来作武器。”他们硬说中国民间文学是“伪造”的，是借民间文学搞政治宣传。他们还在义和团故事中找出“洋人盗宝”的话，加以攻击。他们说应为“胡人盗宝”，硬说我们是为了政治宣传而编造了“洋人盗宝”，甚至把故事中洋人杀小孩的情节也歪曲为我们编造故事的证据。这几位先生难道不知道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再发生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财宝的事吗？八国联军在天津烧杀又岂止杀一个孩子？这确是严峻的事实。义和团故事中不过仅仅留下一点儿历史的影子，如果对这一点都不敢予以正视，还谈什么民间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呢！

艾伯哈德先生编了一部《世界民间故事》。书中选用了三、四篇中国解放后搜集的民间故事。他在注释中说，这些故事都是“乱改的”，“编造”出来的。他的证据之一是傣族民间故事《双头凤》。他说，那是为了宣传团结的重要而发表的。《双头凤》是我早已选入《中国民间故事选》的作品。当时，我也并不曾想到选它是为了宣传团结，只是因为它是一篇优美的故事，它告诉人们不可轻信，不要受挑拨，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吧？大凡优秀的民间故事都含有一定寓意，在美的享受中，人们默默地接受它的启示和熏陶，这难道不是世界民间故事所共有的特点吗！

丁乃通先生是研究世界民间故事的，他发现中国解放后搜集的民间故事，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很多故事在中国邻国或其他国家也有流传。《双头凤》的疑案被他戳穿了，他指出邻国也流传着同样内容的故

事。因此，他认为，艾伯哈德等少数人对中国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

我是一九七八年认识丁乃通先生的。那年七月二十三日，丁教授第一次回国访问，我见到了他，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对我讲起在美国发生的这场风波。丁乃通先生从研究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的广阔视野发现了当时敌视中国的几位民俗学家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无理攻击，特别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借民间故事记录整理中个别不够科学的地方，从政治上大肆攻击新中国。丁先生奋起回击了这股小小的逆流。丁乃通先生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气，他的科学态度，象事实本身一样坦露在人们面前。

我们从来也不隐瞒这样的事实，就是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和不足。有的搜集者由于缺乏经验或受“左”的思想影响，不重视民间文学记录的忠实性，甚至以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为理由，随意修改。这样“整理”出来的民间故事只能是假古董。我们反对这种主张，并已在纠正这种做法。《泰山故事大观》就是通过实地调查以实例说明我们所坚持的“忠实记录、慎重悉理”的科学态度。搜集整理和推广民间故事为人民服务，无疑是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指导思想。记录、整理民间文学的科学性与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并不矛盾。人民并不需要你乱改的作品；那种作品既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艺术性。有一些同志对民间文学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不够了解，因而在工作中产生一种幼稚的错误主张和做法，这也并不足怪，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和历史经验。

从我第一次见到了丁乃通先生以后，在我的印象中，丁先生始终是我们的一位真挚的朋友，是中国民间文学